

樊超 / 著

合作与共赢： 蜜月期的中国与美国

*Cooperation and Reciprocity
Sino-US relationship in the honeymoon stage*



世界知识出版社

樊超 / 著

合作与共赢： 蜜月期的中国与美国

*Cooperation and Reciprocity
Sino-US relationship in the honeymoon stage*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合作与共赢：蜜月期的中国与美国 / 樊超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012-5235-0

I. ①合… II. ①樊… III. ①中美关系—对外政策—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20929号

责任编辑

张迎辉

责任出版

赵 玥

书 名

合作与共赢：蜜月期的中国与美国

Hezuo Yu Gongying: Miyueqi De Zhongguo Yu Meiguo

作 者

樊 超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1092毫米 1/16 20¼印张

字 数

310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7月第一版 2016年7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235-0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樊超博士的著作《合作与共赢——蜜月期的中国与美国》(以下简称《合作与共赢》)即将出版。我作为樊超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首先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贺,对于踏上学术旅途的青年学者,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近两年来,我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不断有著作问世,这些论著都是在他们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几年修改后成书。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学术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学术界和社会对他们研究成果的认可。我在指导研究生从开始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到艰苦收集资料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都会陈述这样的看法,即对于所涉研究领域的发展,每篇博士论文都应成为学科进步的一块坚实的铺路砖,要让后人可以比较放心地踏在上面向前进;对于个人的学术生涯,则应以能够基本达到出版水平为目的要求和管理自己撰写博士论文的工作。至于获得博士学位则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必然结果。“取法乎上得其中”,较高的标准是写出较好质量的博士论文的必要条件。《合作与共赢》能够出版实际上反映了樊超博士一直在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并终于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果。我再次表达由衷的祝贺。

《合作与共赢》系统探讨了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及其之后一个时期中国对美国政策的缘起、形成和演变。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对美政策是一个富有挑战的研究课题。这首先是因为从中美关系正常化40年的历史看,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中国对美政策奠基的时代。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诸多战略、策略、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它们后来虽然有很多复杂的发展,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但

可以确定地说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迄今为止的所有改变都还没有超出当年形成的基本框架，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对美政策必定会是一成不变的，以及今后也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变化。所以，如果不系统全面地了解20世纪80年代对美政策的各个方面，读者将缺少一个了解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到今天的至关重要的参考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与共赢》作为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对美政策的著作，为研究和了解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与形成等，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开端。

其次则是因为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美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政策的研究都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即缺乏足够丰富的历史档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曾经开放了1949年10月建国前后到1965年的部分历史档案，那之后的档案则没有开放。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特别是外交史研究的学者，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我在其他场合包括给其他类似论著所写的序言中每每提及此一困境，总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逐步有所改变。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美国方面公布的档案相比较而言是很丰富的，这些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论著主要都是依据美国公布的外交档案。例如，美国政府已经解密了尼克松政府时期大量的外交档案，包括中美两国领导人历次会谈的记录。最新的进展是去年美国政府公开了卡特政府时期有关对华政策的大量重要档案，使历史学界得以利用来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检验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可以发现新的史实，并据以重新解读那段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理由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又会有一批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当然，这也从一个方面提出了那个老问题：中国的学者、学生们何时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中国的档案在这个领域做研究。这不仅对他们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也对中国外交史研究至关重要，还可以不夸张地说，对中国人的历史观乃至世界观也很重要，毕竟中国人今天与世界相处的精神面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们阅读的中外关系历史决定的。当代诸多重大事态一再证明，中国人的世界观和面对世界的精神状态等，都同我们接受的相关历史知识有密切关系。我们吸收的历史知识的质量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面对世界时的思考水平。所以，我和所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中国学者、学生们一样，继续期待着中国外交档案能够依法依规对外界开放，尽管这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的。

《合作与共赢》能在此一时刻出版可谓正逢其时，这样说是因为中美关系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等研究领域都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尤其是对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研究，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被发现和整理出版，促进了人们扩展认识的视野和思考水平的大幅提升。以往的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在新发现的证据之中被检验，并需要有新的补充和解读。《合作与共赢》的确有很多新的发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对丰富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尤其是中国对美政策等，都是重要的贡献，这固然得益于有新的历史档案被公布。樊超博士为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在查阅和收集历史档案和文献方面做出了巨大和艰苦的努力。我当时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亲见了他用一年时间在华盛顿的各个重要档案馆为查阅和收集历史档案所付出的艰苦努力，这对他完成自己的研究课题是必不可少的。更重要的是他一定由此亲身体会和理解了何为脚踏实地做扎扎实实、老老实实的研究，并能体会到有所发现、有所贡献的快乐。学术人生不过如此而已，凡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有真贡献的学者，必定要做艰苦的劳动并最终理解何为乐在其中。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能够相当高效地使用手机拍摄档案，对他右手持手机、左手快速翻页、然后拍照的动作很有些佩服。

我在其他场合也反复指出过，由于中美两国外交档案开放的进程存在太大的差距，很多有关中美关系历史的论著受到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基本上可以说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对中国的政策和行为缺少深入细致的叙述，更不要说对中国的决策过程展开深入的研究。樊超博士显然很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他不仅大量收集和利用美国方面新公布的档案和历史文献，也大量查阅和收集了中国方面的历史文献，在档案尚未公布的条件下，几乎尽其所能地利用了当事人的回忆录、年谱、文集和报刊资料，等等。樊超博士的这些努力反映在《合作与共赢》这本书中，读者可以读到不少鲜为人知或过去没有被人们重视的中国政策的变化、中国决策层思考和行动的历史细节，它们是从中方的历史文献中新被挖掘出来的，其重要性一方面可以丰富对这个历史进程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纠正以往因缺乏历史档案而造成的误读误判。可以说对中国决策过程的重要史实的发掘并在此基础上对以往一些误读的校正等，是《合作与共赢》的重要特点，

也是该书在这个领域的重要贡献。

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尽可能准确的叙述，是对历史研究这个学科的最基本的要求。有些人对此似乎不以为然或难以理解，这其实是对“历史事实”之于研究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理解和重视。即便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很多领域，“事实”以及对其了解和理解的准确性，等等，也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有不少研究成果读着空洞乏味，属隔靴搔痒、无的放矢一类，这同研究者欠缺对掌握“准确的事实”这一根本原则的重要性的理解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些论著干脆就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错误了解而得出的结论，这在中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等研究领域，表现得比较明显。特别是有些研究者掌握了一些专业、基本的理论知识，却不愿下工夫去尽可能准确地了解研究的对象，甚至错误地解读研究对象，就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去选取、切割事实，以便使一些片面的甚至是碎片化的事实适应单一理论视角的需要。这犹如有可能是饱读医书却不重视病人本身的大夫，他们对病人的症状、病史和家族病史等“事实”缺乏系统、清楚和准确的了解，开出的药方轻者不能对症下药，重则误人性命。研究也没什么不同，那些不理解甚或轻视“事实”、对尽其可能地追问、追究和挖掘真相的极其重要性不理解甚或轻视的人，很难做出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这并不是说每个研究者都要去做考证事实的工作，那首先应该是历史研究者必须完成的任务，但从事各种研究都需要足够的理解，尽可能地掌握“准确的事实”对于形成可靠的知识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所以，研究者就应该将研究建立于尽可能可靠的“事实”之上，并对自己的判断、结论等始终保持一份必要的谨慎。历史研究的发展一再证明，许多重要的结论会随着新的发现而作必要的修订，甚至被完全改写。那种轻视原始资料的收集和追究事实准确性的态度，会极大地损害甚至摧毁研究成果的质量，削足适履式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有所建树的。作为历史研究者，不仅要尽可能地掌握研究领域的历史资料，而且要熟读细读到了如指掌的程度。樊超博士在完成这本书后一定深有体会，唯其如此才会不断更上层楼。

樊超博士在撰写《合作与共赢》的过程中很重视叙事的准确性。不过这本书的贡献不仅在于此。通过对这些历史文献的仔细深入的分析，并与美国方面公布的有关档案进行对比，樊超博士清晰地揭示出中国对美政

策演变的过程和基本脉络。《合作与共赢》围绕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美政策这个主题，全面地叙述和分析了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其中包括了1979年中美建交的过程、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启动与曲折、中国对印度支那地区政策的变动，等等。《合作与共赢》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即中国对美政策是在中国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结构中形成和发展的。内部因素包括了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变，即从结束“文革”到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围绕这项划时代的战略转变展开的持续变动的政治形势，等等。外部因素则主要包括了苏联的扩张和中美苏战略三角的互动、中国周边地区当时主要是印度支那地区的安全形势变化，等等。由于研究视角比较开阔，樊超在《合作与共赢》中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它包括三个关键性因素，即“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美苏冷战格局制造出一种排他性的国际关系逻辑”，以及中国“决策层内部具体的争论结果”等。尤其是对决策层内部的具体争论及其对政策的影响的分析，初步建构了一个分析中国决策层的结构，这对研究这个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也很有启发。

作为历史研究的成果，首先要有清晰和准确的叙事，不过一些研究成果往往会到此为止，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就中国对美政策这个个案而言，所涉及的那些经过认真考证和整理的“事实”到底意义何在，还取决于研究者是否能提供一个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框架，而且这个框架所涉及的一些关键要素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所有主要方面都应该是至关重要的。简而言之，如果不系统全面地叙述那个时期对美政策的各个方面，读者将缺少对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完整理解；如果不提供一个清晰的大致合理的分析框架，读者也会难以理解那些叙述的意义何在，以及作者为什么会认为是这些而非那些事实更有价值；由于这个时期中美关系的特殊重要性，如果这个框架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各主要方面没有更广泛的解释力，这在逻辑上也是难以自洽的。所以，《合作与共赢》将中国对美政策研究向前推进了很有意义的一步。当然，这本书也留下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还可以在更为开放的架构中，理解和阐述中国对美政策所产生的重要背景、决策过程和决策机制，以及当年那些重大决定的历史性影响——

不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

读过《合作与共赢》之后，也包括之前为其他博士的论文出版撰写序言之后，还是有很多感慨的。如同为其他博士的著作所写的序言一样，我在指导他们的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新的重要信息，也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这对我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过程的确是师生相互学习、探讨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的过程。我真心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延续下去，这当然是因为多年形成的师生之谊，但并不仅仅是为了延续之，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为改变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研究领域那种很不能令人满意的现状，继续共同做出努力。毫不夸张地说，迄今为止，学术界甚至都没有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提供一个足够完整的画面，更谈不上丰富多彩。正如《合作与共赢》所说的，以往的成果“既无法呈现中国外交或对外关系的全部面貌，也会因为无法探究决策的细节而使结论发生偏差”。现有的成果中仍然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重新考察和订正，支撑一些重要结论的根基远谈不上稳固，还有太多的疑问需要经过重新探索和思考后，才能给出靠得住的答案。形象地说，我们现在都还是要做“拼图”的工作，每项研究都是在填补中国外交历史这块“拼图版”上的一块空白。总之任重而道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这仍然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合作与共赢》是樊超博士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是他对这个领域的一份贡献，也是他为读者奉献的一份很有价值的历史参考。希望樊超博士以及他的同伴们继续努力，做出更多的贡献。“功夫不负有心人”，与樊超博士共勉。

牛军*

2016年1月20日

*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教授，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目 录

第一章 序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论著的核心观点	2
三、文献综述	14
四、研究的创新与研究意义	24
第二章 建交：中国对美政策的飞跃	27
第一节 战略关系及其局限性	29
第二节 新生动力的孕育	42
第三节 时间压力与建交谈判	68
第三章 “间接同盟军”	85
第一节 “联美反苏”战略的意外开启	86
第二节 对外政策争论与对美政策的稳定	106
第三节 “联美反苏”的政策红利	130
第四章 转变时刻	157
第一节 “联美反苏”的双刃剑效应	158
第二节 逼上谈判桌	172

第三节 边缘政策催生的战略调整	208
第五章 对美政策从争论到稳定	226
第一节 内部争论与双边关系的改善	226
第二节 近美远苏：中美关系的基础	250
第三节 战略的馈赠	273
结 语	292
参考文献	297
中文部分	297
英文部分	303
致 谢	308

第一章 序论

一、问题的提出

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提出了恢复美台外交关系、对台军售等主张。而此时的中国却正期待着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更进一步，尤其是解决建交时遗留的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双方严重对立的政策迎头相撞，引发了中美建交后的第一场外交危机。这场较量以双方达成《八一七公报》而告终。以《八一七公报》谈判为开端，中国开始调整对美国的政策，这主要集中在中美战略关系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国放弃了“以苏划线”的“一条线”战略，压缩了与美国战略合作的范围和广度。此前的中美战略合作是针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扩张，既有军事和政治上的遏阻，也有舆论上的抨击。而调整后的中美战略合作只把针对的矛头集中在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上。这样，中国设想的中美战略合作就不再以打乱苏联的全球战略为目的，而只是针对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同时，中国还降低了中美战略合作的调门，在中共十二大上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开始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都持批评态度。

在很多研究中，中国对美政策的这种调整被称作与美国拉开距离。从达成《八一七公报》之后的情况来看，中美经历了近一年的冷淡时期，确实有拉开距离的感觉。在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不但面临着包括人权、经

贸、司法等诸多领域的摩擦，还需要处理好当时的美国对台军售和台湾前途决议案等问题。中国方面希望美国能遵守《八一七公报》的原则，并继续施加了一定的外交压力。换言之，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之后，中美关系的冷淡期也紧跟而来。但这一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到1983年底，中国停止了外交上的僵持和试探，转而继续推进中美关系。中美随即迎来了两国首脑的互访，经贸科教领域的关系迅速发展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美间的摩擦都没有再干扰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态势。

中美关系后来的快速发展，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初期的冷淡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说，拉开与美国的距离之后，迎接中美关系的不但不是疏远，而是双边关系的迅速发展。拉开与美国的距离这一结论，显然与中美关系发展的真实状况不相吻合。为什么中国在战略上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之后，中美关系不但没有疏远，反而发展得更加紧密？由此也需要同时思考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从更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中美关系从建交开始，就一直伴随着周期性的外交纠纷甚至是危机。为什么建交后的中国对美政策总是呈现出这种波浪式的起伏和若即若离的特征？简而言之，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左右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寻找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的规律。

二、论著的核心观点

本书认为，所谓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实际上是指中美战略关系的调整。中国压缩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是中国对美战略需求减弱的表现。从具体的实施过程来看，中国是在对美谈判中开启了战略调整，但其发端却可以追溯到1979年中国外交学者们的理论建议。当然，这一调整之所以能够实现，还因为有着现实的基础作为依托。

从整体来看，中国对中美战略合作的调整，首先与中国安全利益的需求息息相关。当苏联威胁感下降的时候，降低与这个最大邻国的激烈对抗，是中国为追求现代化建设和长远地缘安全而做出的合理选择。中苏

对抗的缓和，反映到中美关系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压缩中美间的战略合作。也就是说，中苏关系中的具体进程和互动，是为中国调整对美战略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但从具体的过程来看，触发这一进程的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原因却是中美间关于对台军售的摩擦。压缩中美战略合作是为了消除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印象，削弱里根政府在军售问题上的筹码。从客观效果的角度考察，这样确实可以限制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倒退的企图。

对于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防止里根政府对华政策倒退这两个政策目标，也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上，中国决策层有着高度的共识。

回顾中美关系从缓和到建交，再从调整到稳定，实际上是双方相互需求不断增长的过程。其中，中国在对美关系中的战略需求 and 经济需求，增长最为显著。这种增长的转折点在于，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国内政治尤其是国家发展战略出现的重大变化。这两种需求都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渐变过程。

当苏联被视作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时，中国对美国的战略需求是高度一致的。当苏联威胁逐步显现出其有限性的时候，这种战略需求就经历了由弱到强、由盛而衰的变化。中国在安全需求上的态度也随之经历了复杂的变化，由此塑造出的中美战略关系，定然呈现出起伏不定的特点。

而中国在国家发展议题上对美国的需求则更为复杂。首先是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冷战塑造了以美苏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要在经济发展上对美国有所需求，首要的前提就是中国选定了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逻辑将从根本上决定中美关系发展的状况。

中美之所以能够建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的领导层很快就在加快建设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使经济建设也成为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大议题。在确立这一共识的过程中，高层的出访和专门的考察团出访，使决策层意识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也明确了借鉴西方现代化的思路。正是因为这种设想，才使得改革开放政策，主要是以西方发达

国家的经济科技水平为参照。

历史已经证明，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初步打开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恢复联合国席位，无不是中美缓和带来的收获。所以，当中国要确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前景时，仍然需要稳定而良好的中美关系作为保证。甚至中美关系本身都是中外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发展，都是中国国家战略转变的组成部分。

尽管中美关系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但在改革开放酝酿以及实施的初期，这种价值更多是源自历史的经验和理论层次的设想。而就是这种不确定性，更容易导致对借鉴对象的争论，由此也更容易导致对美需求的不稳定性。相比之下，国家安全战略上的需求对中美关系更具推进作用。经过中苏间的长期对抗，即便“文革”的极“左”氛围消失后，中国领导层仍普遍将苏联视作世界战争根源和国家安全的威胁。所以当苏联的全球战略从20世纪70年代末变得更具张力的时候，安全上的需求让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必要和密切。

但这种源自外在需求而产生的动力，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不稳定性。中美刚一建交，美国国内的亲台势力就表现出强大的反噬力量。《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国内立法的方式出台，既让台湾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也引起了中国决策层在对美政策上的争论。对此，中国以外交交涉的方式与卡特政府达成了默契，压下对苏缓和的呼声，暂时稳定了中美关系。但短暂的交往尚未塑造出一个成型的双边关系，里根还在竞选之时就表现出突破中美“建交公报”的意图。这突破了中国在对美政策上的底线，使中国决策层在对美斗争上达成了共识，最终导致了中美间的一场外交危机，也由此导致了1982年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

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开始于《八一七公报》的谈判，而决策层如何认识中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外交施压手段，塑造了这次调整的关键内容。中美间的战略合作，是两国在建交初期发展最快、成果最为显著的，也是中方最关注、最满意的领域。从缓和到建交，战略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断得到提升和发展。中美战略关系的成熟和发展，对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改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它不但帮助中国摆脱了单独应对苏联的战略劣势，还打乱了苏联在亚洲东部地区的战略布局，极大消耗了苏联的国力，分散和牵制了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决策者们也相信，中美间的战略合作，对重新强化冷战政策的美国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无疑使中美战略关系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所以当强硬反苏的里根政府上台时，中国有理由相信，可以凭借这种战略关系，在中美关系中达成更多的目标。这是中国面对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为何能够发动一场外交攻势的重要原因。

但中国决策层很快就在谈判中意识到战略价值的有限性。在《八一七公报》的谈判过程中，中国以战略关系为筹码施压，但却发现其作用是有限的。与此同时，美方也坚信，中美战略合作是中国最迫切的需要。用邓小平的总结就是，美国认为中国有求于人。因而美方也拒绝轻易做出外交让步，双方由此陷入了一场勇气与耐力的较量当中。总而言之，中美战略关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在外交技术层面，其价值或作用都遇到了一个瓶颈，要么成为一种时隐时现的负担，要么被证明是一种分量不足的外交筹码。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逐渐铺开，中国在国际上的利益不断拓展，国家利益必然会变得更加多元化，这从总体上要求中国与世界各国都保持正常的或者良好的国家关系。而“以苏划线”的外交战略显然会排斥很多与中国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国家。总之，在安全形势有所改善的情况下，“以苏划线”作为中美战略关系的指导原则，已经无法完全适应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能够同时解决以上问题的选项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有必要适度调整或压缩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而理论派在中美建交的第一年就已经意识到中美过于密切的战略关系可能会带来外交战略回旋余地不足的问题，也曾提出拉开与美国的距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对美政策调整与此后短暂的冷淡期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二者最大的联系就是战略需求减弱后，对中美关系的修复作用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而迅速。中美关系暂时处于冷淡是双边关系中的结

构性矛盾导致的。随着中美在各个领域的交往加深，两个国家的巨大差异开始凸显出来，于是双方在胡娜事件、湖广铁路债券案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纠纷迁延日久。这种摩擦是国家关系中常见的现象，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对于当时中国的领导层而言，这些摩擦都显得过于陌生。他们既无法在第一时间就对这些问题做出定性判断，也没有经验和现成的路径来迅速处理这些问题，只能从非专业的常识或本能来做出判断。

但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中的另一争议问题，极大地影响和决定着中国领导人对这些摩擦的判断。《八一七公报》达成之后，中国期待看到美国政府能严格履行在公报中的承诺。恰在此时，对台军售和台湾前途决议案等问题摆上了美国国内政治的议程。里根政府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将检验美国是否愿意遵守《八一七公报》的原则。但美国国会和里根政府在这两个议题上的表态都没能体现出公报的原则，所以再次引发了两国间的外交纠纷。

这极容易让中国领导人相信，涉台纠纷与两国间的摩擦都是美国有目的反华的组成部分，因而一直怀疑美国发展友好对华关系的诚意。中美围绕这些问题的纠纷甚至一度威胁到即将到来的两国首脑互访。换言之，这一时期对中美关系更具冲击力的还是1983年底双方围绕台湾问题导致的纠纷。但在美方的一再澄清下，有人主张应相信美方的解释，停止继续施压，转而将精力集中在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上，这一观点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对美政策就此逐渐稳定下来。

对美政策上的稳定，是中国对美经济需求发生作用的直接结果。进入1982年，中国的经济调整已经基本结束缩短基本建设、平衡财政收支的压缩阶段，中国在对外经济技术和项目引进上的规模又进入了增长的阶段。这意味着国家经济建设即将在对外领域全面铺开。事实证明，中美在摩擦不断的同时，经济关系也逐步回升。在这样一个时刻选择搁置外交纠纷，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显然是把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建设的议题置于了主导地位。由此也可以看出，战略派的设想实现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当中国在对美经贸、科技领域有了实质性进